

“东亚地中海”视野中的钓鱼岛问题

张 生

内容提要 把东海和黄海及其附属各海峡通道和边缘内海定义为“东亚地中海”，以此来观察钓鱼岛从东亚边缘性存在演变为东亚核心问题的历史过程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近代以前中国千余年间在“东亚地中海”周边国际关系中占有主导权，但日本逐步提出挑战。在此期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被中国首先发现、命名、使用，并被中日琉各种古籍确认为中国属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吞并琉球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取得“东亚地中海”控制权，窃取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二战后，“东亚地中海”控制权转移至美国。美国在独家战略托管琉球过程中，非法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琉球民政府管辖范围。经朝鲜战争，美国确立扶持日本重新成为亚洲大国并使其与“自由世界”结盟的国策，承诺向日本“归还”琉球施政权。“归还”之际，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施政权裹挟在琉球中私相授受给日本，同时宣布在主权问题上“中立”，从而制造出钓鱼岛问题并居间利用。东亚制海权的转移，成为钓鱼岛问题产生的动因。

关键词 钓鱼岛 东亚地中海 中日美关系

所谓“地中海”，通常是指北非和欧洲、西亚之间的那一片海洋，在古代世界历史中，曾经是埃及、希腊、波斯、马其顿、罗马、迦太基等群雄逐鹿的舞台。近代以来，海权愈形重要，尼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意大利、德国乃至俄罗斯，围绕地中海的控制权，演出了世界近代史的一幕幕大剧。

虽然，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引用前人的话说“新大陆至今没有发现一个内海，堪与紧靠欧、亚、非三洲的地中海相媲美”^①，但考 mediterranean 的原意，是“几乎被陆地包围的(海洋)”之意。欧亚非之间的地中海，固然符合此意，其他被陆地包围的海洋，虽然早被命名为他名，却也符合地中海的基本定义。围绕此种海洋的历史斗争，比之欧亚非之间的地中海，其实突破了西哲的视野，堪称不遑多让。典型的有美洲的加勒比海，以及东亚主要由东海、黄海构成的一片海洋。

本文之意，正是要将东海和黄海，及其附属各海峡通道和边缘内海，称为“东亚地中海”，以此来观照钓鱼岛问题的产生。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扉页。



一

古代东亚的世界,由于中国文明的早熟和宏大,其霸权的争夺,主要在广袤的大陆及其深处进行。但东吴对东南沿海的征伐和管制,以及远征辽东的设想^①,说明华夏文明并非自隔于海洋。只不过,由于周边各文明尚处于发轫状态,来自古中国的船舰畅行无忌,相互之间尚未就海洋的控制产生激烈的冲突。

唐朝崛起以后,屡征高句丽不果,产生了从朝鲜半岛南侧开辟第二战场的实际需要。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雄心与之产生了交集,乃有唐军从山东出海,与新罗击溃百济之举。百济残余势力向日本求援,日军横渡大海,与之联手,于是演出唐—新罗联军对日本—百济联军的四国大战。

“东亚地中海”第一次沸腾。论战争的形态,中日两国均是跨海两栖作战;论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比之同时期欧亚非之间的地中海,有过之无不及。公元 663 年 8 月,白江口会战发生,操控较大战船的唐军水师将数量远超自身的日军围歼。^② 会战胜利后,唐军南北对进,倾覆立国 700 余年的高句丽,势力伸展至朝鲜半岛北部、中部。

但就“东亚地中海”而言,其意义更为深远:大尺度地看,此后数百年间,虽程度有别,东亚国际关系的主导权被中国各政权掌握,中日韩之间以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主要诉求,并与朝贡、藩属制度结合,演进出漫长的“东亚地中海”和平时代。遣唐使和鉴真东渡可以作为这一和平时期的标志。

蒙古崛起后,两次对日本用兵。1274 年其进军线路为朝鲜—对马岛—壹岐岛—九州,1281 年其进军路线为朝鲜—九州、宁波—九州。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本虽无力反攻至东亚大陆,但已部分修正了西强东弱的守势。朱明鼎革以后,朱元璋曾有远征日本的打算而归于悻悻,倭寇却自东而西骚扰中国沿海百年。《筹海图编》正是在此背景下将钓鱼屿、赤屿、黄毛山等首次列入边防镇山。^③

明朝初年郑和远洋舰队的绝对优势,没有用来进行“东亚地中海”秩序的“再确立”;明朝末年,两件大事的发生,却改写了“东亚地中海”由中国主导的格局。一是万历朝的援朝战争。1591 年、1597 年,日本动员十万以上规模的军队两次侵入朝鲜,明朝虽已至其末年,仍果断介入,战争虽以保住朝鲜结局,而日本立于主动进攻的态势已经显然。二是 1609 年的萨摩藩侵入琉球,逼迫已经在明初向中国朝贡的琉球国同时向其朝贡。日本在北路、南路同时挑战“东亚地中海”秩序,是白江口会战确立东亚前民族国家时代国际关系框架以来,真正的千年变局。

二

琉球自明初在中国可信典籍中出现^④,这样,“东亚地中海”的东南西北四面均有了政权。中日

① 《吴书二·吴主传第二》,(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 47 卷,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② 参见韩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43—66 页。

③ 《沿海山沙图·福七·福八》,(明)胡宗宪撰:《筹海图编》第 1 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8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4 页。

④ 成书于明永乐元年(1403)《顺风相送》载:“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近。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这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钓鱼屿、赤屿等钓鱼岛群岛名称的史籍,也是中琉交往的见证。本处《顺风相送》使用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所藏版本,南京大学何志明博士搜集。句读见向达《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95—96 页。

朝琉四国势力范围犬牙交错,而中国在清初统一台湾(西班牙、荷兰已先后短期试图殖民之)和日本对琉球的隐形控制,使得两大国在“东亚地中海”南路发生冲突的几率大增。

对于地中海(此处泛指)控制权的争夺,大体上有两种模式。一是欧亚非之间地中海模式,强权之间零和博弈,用战争的方式,以彻底战胜对方为目标,古代世界的罗马、近代的英国,均采此种路径。二是加勒比海模式,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本与奉行“门罗主义”的美国“利益始终不可调和”,在加勒比海“直接对抗”,但感于加勒比海是美国利益的“关键因素”,乃改而默许美国海军占据优势^①,这是近代意义上的绥靖。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难民被害事件出兵中国台湾,实际上是采取了上述第一种模式解决“东亚地中海”问题的肇端。琉球被吞并,乃至废藩置县,改变了“东亚地中海”南路的相对平衡格局,钓鱼岛群岛已被逼近——但在此前后,钓鱼岛均被日本政府视为日本之外——1873年4月13日,日本外务省发给琉球藩国旗,要求“高悬于久米、宫古、石垣、八重、与那国五岛官署”,以防“外国卒取之虞”。其中明确了琉球与外国的界线。^② 在中日关于琉球的交涉中,日本驻清国公使馆向中方提交了关于冲绳西南边界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的所有岛屿名称,其中并无钓鱼岛群岛任何一个岛屿。^③ 1880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调停中日“球案”争端后,“三分琉球”未成定议,中日在“东亚地中海”南路进入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日本采取低调、隐瞒的办法,对钓鱼岛进行窥伺,寻机吞并。

1885年10月30日,冲绳县官员石泽兵吾等登上钓鱼岛进行考察。^④ 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捨三致函内务卿山县有朋等,提出在钓鱼岛设立国家标志“未必与清国全无关系”。^⑤ 12月5日,山县有朋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内部报告,决定“目前勿要设置国家标志”。^⑥ 这一官方认识,到1894年4月14日,日本内务省县治局回复冲绳知事关于在久场岛、鱼钓岛设置管辖标桩的请示报告时,仍在坚持。^⑦ 同年12月27日,内务大臣野村靖鉴于“今昔情况不同”,乃向外务卿陆奥宗光提出重新审议冲绳县关于在久场岛、鱼钓岛设置管辖标桩的请示。^⑧ 随后,钓鱼岛群岛被裹挟在台湾“附属各岛屿”(《马关条约》用语)中,被日本逐步“窃取”。

野村靖所谓“今昔情况不同”,指的是甲午战争的发生和中国在“东亚地中海”北侧朝鲜、东北战场上的溃败之势。通过战争,日本不仅将中国从中日共同强力影响下的朝鲜驱逐出去,且占据台湾、澎湖,势力伸展至清朝“龙兴之地”的辽东。白江口会战形成的“东亚地中海”秩序余绪已经荡然无存,“东亚地中海”四面四国相对平衡的局面,简化为中国仅在西侧保留残缺不全的主权——

^①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李少彦等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529—530页。

^② 村田忠禧著,韦平和等译:《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③ 《宫古、八重山二島考》(光緒六年九月四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01/34/009/01/009。

^④ 「魚釣嶼他二嶼巡視調査の概略」(明治18年11月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41152300(第18画像目から)、帝国版国関係雑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 村田忠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第171页。

^⑥ 「秘第一一二八号ノ内」(明治18年12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2910000(第2画像目から)、公文別録·内務省·明治十五年~明治十八年 第四卷(国立公文書館)。

^⑦ 「甲69号 内務省秘別第34号」(明治27年4月1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41152300(第47画像目から)、帝国版国関係雑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⑧ 「秘別133号 久場島魚釣島へ所轄標杭建設之義上申」(明治27年12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41152300(第44画像目から)、帝国版国関係雑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列强掀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的结果,更使得日本沿“东亚地中海”北侧,部署其陆海军力量至中国首都。“在地中海的范围内,陆路和海路必然相依为命”。^① 陆路和海路连续战胜中国,使得日本在“东亚地中海”形成对中国的绝对优势。

1300 年间,“东亚地中海”秩序逆转,钓鱼岛从无主到有主的内涵也发生了逆转。“海权论”创始人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所谓“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②,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诠释。

三

格兰特调停中日“球案”时曾指出:姑且先不论中日之是非,中日之争,实不可须臾忘记环伺在侧的欧洲列强。^③ 那时的美国,刚刚从南北内战的硝烟中走来,尚未自省亦为列强之一。但富有启发的是,中日争夺“东亚地中海”主导权前后,列强就已经是“东亚地中海”的既存因素。“东亚地中海”的秩序因此不单单是中日的双边博弈。而在博弈模型中,多边博弈总是不稳定的。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只是序曲,英国在 19 世纪初成为东亚海洋的主角之一,并曾就小笠原群岛等东亚众多岛屿的归属,与日、美产生交涉。英国海图对钓鱼岛群岛的定位,后来被日本详加考证。^④

美国佩里(Matthew Perry)“黑舰队”在 19 世纪 50 年代打开日本幕府大门之前,对《中山传信录》等进行了详细研究,钓鱼岛群岛固在其记述中,而且使用了中国福建话发音的命名。顺便应当提及的是,佩里日本签约的同时,也与琉球国单独签约(签署日期用公元和咸丰纪年),说明他把琉球国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俄罗斯、法国也在 19 世纪 50 年代前后不同程度地活跃于“东亚地中海”。

甲午战争,日本“以国运相赌”,其意在与中国争夺东亚主导权,客观结果却是几乎所有欧美强国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进入“东亚地中海”世界。日本虽赢得了对中国的劣势,却更深深地被列强所牵制。其中,俄罗斯、英国、美国的影响最大。

大尺度地看,在对马海峡击败沙皇俄国海军,是日本清理“东亚地中海”北侧威胁的重大胜利,库页岛南部和南千岛群岛落入日本控制。但俄罗斯并未远遁,其在堪察加半岛、库页岛北部、滨海省和中国东北北部的存在,始终让日本主导的“东亚地中海”秩序如芒刺在背,通过出兵西伯利亚、扶植伪满洲国、在诺门坎和张鼓峰挑起争端以及一系列的双边条约,日本也只能做到局势粗安。而“东亚地中海”的内涵隐隐有向北扩展至日本海乃至鄂霍次克海的态势。因为“俄国从北扩张的对立面将主要表现在向位于北纬 30° 和 40° 之间宽广的分界地带以南的扩张中”。^⑤ 事实上,二战结束前后,美国预筹战后东亚海洋安排时,就将以上海域和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岛屿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将其与自己准备占据小笠原群岛、琉球群岛关联起来,显然认为其中的内在逻辑一致。^⑥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 2 卷,第 931 页。

②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附亚洲问题》,“出版说明”。

③ 《七续纪论辨琉球事》,《申报》,1880 年 4 月 26 日,第 4 版。

④ 「久米赤島・久場島・魚釣島の三島取調書」(明治 18 年 9 月 21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3041152300(第 8 画像目から)、帝国版図関係雑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附亚洲问题》,第 466 页。

⑥ *Liuchiu Islands(Ryukyu)* (14 April 1943), 沖繩県公文書館藏, 美國蒐集文書 · Liuchius (Ryukyus) (Japan), 059/00673/00011/002。

在日本主张大东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东亚洋中岛屿主权的过程中，英国采取了许可或默认态度。日本占据中国台湾，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直接面对香港、上海等英国具有重大利益的据点，也未被视为重大威胁。其与日本1902年结成的英日同盟，是日本战胜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重要因素。但是，一战后日本获得德属太平洋诸岛，这与英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产生重叠，成为英日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之一。1922年《九国公约》取代英日同盟，使得日本失去了维护其“东亚地中海”秩序的得力盟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英国远东利益的排挤更呈现出由北向南渐次推进的规律。攻占香港、马来亚、新加坡，是日本对英国长期积累的西太平洋海权的终结，并使得“东亚地中海”的内涵扩张至南海一线。

虽然由于后来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美国在中国往往被视为列强的一员，实际上在佩里时代，英美的竞争性甚强。格兰特的提醒，毋宁说是一种有别于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的“善意”，他甚至颇具眼光地提出：日本占据琉球，如扼中国贸易之咽喉^①——这与战后美国对琉球群岛战略位置的看法一致^②——深具战略意义。

美西战争，使得“重返亚洲”的美国在“东亚地中海”南侧得到菲律宾这个立足点，被马汉誉为“美国在空间范围上跨度最广的一次扩张”^③，但美国在“东亚地中海”的西侧，要求的是延续门罗主义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早有论者指出，美国的这一政策，客观上使得中国在19世纪末免于被列强瓜分。^④ 而对日本来说，美国逐步扩大的存在和影响，使其在战胜中国后仍不能完全掌控“东亚地中海”。马汉指出：“为确保在最大程度上施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需要明显的实力，不仅要保持在中国本土的实力，而且要保持海上交通线的实力，尤其是最短航线的实力”。^⑤ 美国对西太平洋海权的坚持，决定了美日双方矛盾的持久存在。日本起初对美国兼并夏威夷就有不满，而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不断后撤其东亚防御线之后，美国成为日本“东亚地中海”制海权的主要威胁，日本对美国因素的排拒，演成太平洋战争，并使得钓鱼岛问题的“制造”权最终落入美国手中。

四

本来，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询问蒋介石中国是否想要琉球，但蒋介石提议“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理由是“一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也”。^⑥

德黑兰会议期间，美苏就“东亚地中海”及其周边的处置，曾有预案，并涉及琉球：

……罗斯福总统回忆道，斯大林熟知琉球群岛的历史，完全同意琉球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因此应当归还给中国……^⑦

① 《七续纪论辨琉球事》，《申报》，1880年4月26日，第4版。

② U. S. Policy toward Japan, Top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May 17, 1951,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ereafter DNSA), PDD00141.

③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第460页。

④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3页。

⑤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第527页。

⑥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5)，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472页。

⑦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FRUS),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Pacific War Council,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pp. 868–870.

宋子文、孙科、钱端升^①以及王正廷、王宠惠^②等人对琉球态度与蒋不一，当时《中央日报》、《申报》等媒体亦认为中国应领有琉球，但蒋的意见在当时决定了琉球不为中国所有的事实。蒋介石的考虑不能说没有现实因素的作用，但海权在其知识结构中显然非常欠缺，“东亚地中海”的战略重要性不为蒋介石所认知，是美国得以制造钓鱼岛问题的重要背景。

在所有的地中海世界中，对立者的可能行动方向是考虑战略安排的主要因素，“东亚地中海”亦然。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在给中国战场美军司令的电文中重申了《波茨坦宣言》的第八条：“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执行，日本的主权必须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我们所决定的一些小岛屿。”^③但苏联在“东亚地中海”的存在和影响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针对因素，对日处理，已不是四大国共同决定。美国认为，“中国、苏联、英国和琉球人强烈反对将琉球群岛交还日本”，也认知到“对苏联而言，可以选择的是琉球独立或是将琉球交予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苏联更倾向于后者”。但美国自身的战略地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承认中国的领土要求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中国控制琉球群岛可能会拒绝美国继续使用基地，并且共产党最终打败国民党可能会给予苏联进入琉球群岛的机会。这样的发展不仅会给日本带来苏联入侵的威胁，而且会限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军事地位。^④

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美国总统、国务卿等提出“对日政策建议”：“美国欲长期保留冲绳岛屿上的设施，以及位于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南鸟岛和孀妇岩以南的南方诸岛上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视为必要的其他设施。”^⑤麦克阿瑟指出：“该群岛对我国西太平洋边界的防御至关重要，其控制权必须掌握在美国手中。……我认为如果美国不能控制此处，日后可能给美军带来毁灭性打击。”^⑥1950年10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未等与国务院协商一致，直接批准了给远东美军的命令，决定由美国政府负责北纬29度以南琉球群岛的民政管理。“该地区的美国政府称作‘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命令美军远东司令为琉球群岛总督，“总督保留以下权力：a. 有权否决、禁止或搁置执行上述政府（指琉球群岛的中央、省和市级政府——引者注）制定的任何法律、法令或法规；b. 有权命令上述政府执行任何其本人认为恰当的法律、法令或法规；c. 总督下达的命令未得到执行，或因安全所需时，有权在全岛或部分范围内恢复最高权力”。^⑦美国虽在战时反复宣称没有领土野心，但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在“东亚地中海”中深深地扎下根来。

根据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开宣言不予承认），美国琉球民政府副总督奥格登（David A. D. Ogden）1953年12月25日发布了题为《琉球

① Chinese opinion(8 December 1943), 沖繩県公文書館藏, 美國蒐集文書 · Territorial Problem-Japan: Government Saghalien, Kuriles, Bonins, Liuchius, Formosa, Mandates, 059/00673/00011/001。

② 《王正廷谈话盟国应长期管束日本至消灭侵略意念为止》，《申报》，1947年6月5日，第2版；《王宠惠谈对日和约 侵略状态应消除 对外贸易不能纵其倾销》，《申报》，1947年8月15日，第1版。

③ FRUS, Memorandum b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Subcommittee for the Far East, 1946, Vol. VII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pp. 174 – 176.

④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24 May 1948), 沖繩県公文書館藏, 美國蒐集文書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319/00082A/00023/002。

⑤ Report, NSC 13/2, to the President Oct. 7, 1948,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hereafter DDRS), CK3100347865.

⑥ FRUS,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47, Vol. V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 512 – 515.

⑦ FRUS, Memorandum Approved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50, Vol.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1313 – 1319.

群岛地理边界》(Geographic Boundaries of the Ryukyu Islands)的“民政府第 27 号令”,确定琉球地理边界为下列各点连线:

- 北纬 28 度,东经 124.4 度;
- 北纬 24 度,东经 122 度;
- 北纬 24 度,东经 133 度;
- 北纬 27 度,东经 131.5 度;
- 北纬 27 度,东经 128.18 度;
- 北纬 28 度,东经 128.18 度。^①

上述各点的内涵,把钓鱼岛划进了琉球群岛的范围。正如基辛格 1971 年与美国驻日大使商量对钓鱼岛问题口径的电话记录所显示的,美国明知钓鱼岛主权争议是中日两国之事,美国对其没有主权,但“1951 年我们从日本手中接过冲绳主权时,把这些岛屿作为冲绳领土的一部分也纳入其中了”。^② 钓鱼岛被裹挟到“琉球”这个概念中,被美日私相授受,是美国“制造”出钓鱼岛问题的真相。

在美国对琉球愈发加紧控制的同时,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冷战愈演愈烈,美国眼中的日本角色迅速发生转变,其重要性日益突出。1951 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对日政策声明》(1960 年再次讨论)称,“从整体战略的角度而言,日本是世界四大工业大国之一,如果日本的工业实力被共产主义国家所利用,则全球的力量对比将发生重大改变”。^③ 1961 年,《美国对日政策纲领》进一步宣示了美国对日政策基调为:

1. 重新将日本建成亚洲的主要大国。
2. 使日本与美国结成大致同盟,并使日本势力和影响的发挥大致符合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利益。^④

这使得以美国总统、国务院为代表的力量顶着美国军方的异议^⑤,对日本“归还”琉球(日方更倾向于使用“冲绳”这一割断历史的名词,而“冲绳县”和被日本强行废藩置县的古琉球国,以及美国战后设定的“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并不一致)的呼声给予了积极回应。^⑥ 扶持日本作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归还”琉球,既是美国对日政策的自然发展,也是其对日本长期追随“自由世界”的犒赏。

值得注意的是,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在日本渲染的所谓左派和共产党利用琉球问题,可能对“自由世界”不利的压力下,美国承认日本对于琉球有所谓“剩余主权”。^⑦ 但美国在琉球的所谓“民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权,剥除了行政、立法、司法权的“剩余主权”实际上只是言辞上的安

^① Civil Administration Proclamation No. 27(25 December 1953), 沖繩県公文書館藏, 美國蒐集文書 · Ryukyus, Command, Proclamations, No. 1 – 35, 059/03069/00004/002。

^② Ryukyu Islands, Classification Unknown, Memorandum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June 07, 1971, DNSA, KA05887.

^③ U. S. Policy toward Japan, Top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May 17, 1951, DNSA, PD00141.

^④ Guidelines of U. S. Policy toward Japan, Secret, Policy Paper, c. May 3, 1961, DNSA, JU00098.

^⑤ 美国军方异议见 FRUS,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at Large (Jessup), 1950, Vol.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1278 – 1282。

^⑥ Reversion of the Bonin and Ryukyu Islands Issue, Secret, Memorandum, c. October 1967, DNSA, JU00766.

^⑦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Japanese Demands that the U. S. Return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f the Ryukyu Islands over to them. Dec. 30, 1968, DDRS, CK3100681400.

慰。1951年6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的顾问在备忘录中坦率地表示,美国事实上获得了琉球群岛的主权。^① 美国宣称对中国固有领土拥有“主权”自属无稽,但这也说明日本在20多年中对琉球的“主权”并不是“毫无争议”的。等到1972年“归还”时,美方又用了“管辖权”“行政权”等不同的名词,而不是“主权”,说明美国注意到了琉球问题的复杂性。

由于海峡两岸坚决反对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裹挟在琉球群岛中“归还”日本,美国在“制造”钓鱼岛问题时,发明了一段似是而非、玩弄文字的说法:“我们坚持,将这些岛屿的管辖权归还日本,既不增加亦不减少此岛屿为美国接管前日本所拥有的对该岛的合法权利,亦不减少其他所有权要求国所拥有的业已存在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早于我们与琉球群岛之关系”。^② “国务院发言人布瑞(Charles Bray)在一篇声明中指出,美国只是把对琉球的行政权交还给日本,因之,有关钓鱼台的主权问题,乃是有待中华民国与日本来谋求解决的事”。^③ 美国言说的对象和内容是错误的,但钓鱼岛及其附属群岛的主权存在争议,却是其反复明确的事实。

余 论

在早期的中、日、琉球、英、美各种文献中,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都是“边缘性的存在”。在中日主权争议的今天,它却成为“东亚地中海”的“中心”——不仅牵动美、中、日这三个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前三的国家,也牵动整个东亚乃至世界局势。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具有世界性意义。

马汉曾经设定:“可能为了人类的福祉,中国人和中国的领土,在实现种族大团结之前应当经历一段时间的政治分裂,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德国一样。”^④ 马汉的设定没有任何学理支撑,但确实,台海两岸的政治分裂给了所有居间利用钓鱼岛问题的势力,特别是美国以机会。1971年4月12日,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甚嚣尘上之际,台湾当局“外交部部长”周书楷前往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钓鱼岛问题会在海外华人间产生重大影响,可能造成运动。尼克松顾左右而言他,将话题转移到联合国问题的重要性上,尼克松说:“只要我在这里,您便在白宫中有一位朋友,而您不该做任何使他难堪的事。中国人应该看看其中微妙。你们帮助我们,我们也会帮助你们。”^⑤ 其时,台湾当局正为联合国席位问题焦虑,尼克松“点中”其软肋,使其话语权急剧削弱。果然,在随后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周书楷主动提出第二年的联合国大会问题,而且他“希望‘另一边’(即中国共产党)能被排除在大会之外”。^⑥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张主权和行动,一直遭到台湾当局掣肘。钓鱼岛问题,因此必然与台湾问题的处理联系在一起,这极大地增加了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这是其一。

其二,被人为故意作为琉球一部分而“归还”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在美国有意识、有目的的操弄下,几乎在中日争议的第一天起就进入复杂状态。中国固有领土被私自转

^① FRUS, Memorandum by the Consultant to the Secretary (Dulles), 1951, Vol. VI,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 Part 1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1152–1153.

^② Briefing Papers for Mr. Kissinger's Trip to Japan, Includes Papers Entitled "Removal of U. S. Aircraft from Naha Air Base" and "Senkakus", Secret, Memorandum, April 6, 1972, DNSA, JU01523.

^③ 《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对钓鱼台主权有待中日解决》,台北《中央日报》,1971年6月19日,第1版。

^④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第482页。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 – 1972, Document 113, p. 292.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FRUS)来源于<http://history.state.gov/>. 下同。

^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 – 1972, Document 114, p. 294.

让，自然必须反对。197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绝对不能容忍”“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同时，善意提示日方勿被居间利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日本人民为粉碎‘归还’冲绳的骗局，要求无条件地、全面地收复冲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强烈反对美、日反动派拿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做交易和借此挑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①可以说，态度十分具有建设性。

日本自居与美国是盟友关系，可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美方的充分背书。但其实，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虽然日本一直希望援引美方的表态主张权利，将其设定为“没有争议”，但1972年8月，美国政府内部指示，对日本应当清楚表示：“尽管美国政府的媒体指导已进行了部分修改以符合日本政府的要求，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改变了美国在‘尖阁诸岛’争端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基本立场。”^②更有甚者，1974年1月，已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讨论南沙群岛问题时，为“教会日本人敬畏”，讨论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导”到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③这样看，实际上是“系铃人”角色的美国，并不准备担当“解铃人”的作用——促使中日两国长期在“东亚地中海”保持内在紧张，更符合美国作为“渔翁”的利益。

对美国利用钓鱼岛问题牵制中日，中国洞若观火，其长期坚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创新国际法的、充满善意的政策，目的就是使钓鱼岛这一“东亚地中海”热点冷却下来，走上政治解决的轨道。但其善意，为日本政府所轻忽。日本政府如何为了日本人民的长远福祉而改弦更张、放弃短视思维，不沉溺于被操纵利用的饮鸩止渴，对钓鱼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至关重要。

其三，马汉还说，“富强起来的中国对我们和它自己都会带来更严重的危险”。^④这一断言充斥着“文明冲突论”的火药味和深深的种族歧视，他论证说，“因为我们届时必须拱手相送的物质财富会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是中国对这些物质财富的利用毫无控制，因为它对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思想道德力量缺乏清楚的理解，更不用说完全接受。”马汉以美国价值观作为美国接受中国复兴的前提条件，是今天美国操纵钓鱼岛问题深远的运思基础。

但是，正如布罗代尔总结欧亚非地中海历史所指出的：“历史的普遍的、强大的、敌对的潮流比环境、人、谋算和计划等更为重要、更有影响。”^⑤中国的复兴是操盘者无法“谋算”的历史潮流和趋势，然而，这一潮流并不是“敌对的”，2012年，习近平更指出：“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⑥，充满前瞻性和想象张力的说法，相比于那些把钓鱼岛作为“遏制”中国的“东亚地中海”前哨阵地的“敌对的”计划，更着眼于“人类的福祉”。中国所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摈弃了传统的地中海模式，扬弃了加勒比海模式，内含了一种可能导向和平之海、繁荣之海的新地中海模式，值得“东亚地中海”所有当事者深思。

[作者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197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1971年12月31日,第1版。

② *Issues and Talking Points: Bilateral Issues, Secret, Briefing Paper, August 1972*, DNSA, JU01582.

③ “Minutes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Staff Meeting”,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Volume E – 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 – 1976, Document 327*, p. 3.

④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第522页。

⑤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955页。

⑥ 来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17111739.html>,2012年2月14日。